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之风土人情书写

杨朝蕾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徒西行求法大潮的涌起,释家异域志蔚然滋多。这些异域志以纪实为主,主要记录高僧乘危履险、西行求法的种种经历,亦不乏对异域奇闻异物、风土人情的生动描写。既有对域外自然险境的如实记录,又有对异域奇特事物的传神摹写,还涉及不同国家不同的土风民俗,包括居住环境、饮食习惯、衣着打扮、交通状况、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价值,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释家; 异域志; 风土人情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1)02-0108-09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徒西行求法大潮的涌起,释家异域志蔚然滋多。见诸史料者就有释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释志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惠生《行记》、竺法维《佛国记》、法勇(又名昙无竭)《外国传》、道普《道普传》、竺枝《扶南记》等。除法显《佛国记》完整保存至今,其余释家异域志多已散佚,只能从传世文献中辑录只言片语,虽无法视其全豹,却也可由此一斑而略窥其时著述异域志风气之盛行。这些异域志以纪实为主,主要记录高僧乘危履险、西行求法的种种经历,亦不乏对异域奇闻异物、风土人情的生动描写,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与重要的史料价值。另有释道安,未去过西域,其《西域志》据传闻撰成,颇具志怪色彩。

一、释家异域志之自然险境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尤其是释家行记,因著者跋山涉水,冒险辟路,亲历异域之山川形胜,故将其如实记录下来,颇具历史、地理与文学价值。《佛国记》记载法显神圣而艰辛的西行求法之旅,其以六十岁左右高龄,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归抵崂山登陆,次年达建康,共计15年时间。其用十七天时间,度过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沙漠地带,用准确的笔触描绘此沙河: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6}

法显以“沙河”形容像水一样可以流动的沙,形象而贴切。在古人无法解释流沙形成的原理时,只能将这可怕的具有吞噬功能,且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解释为有“恶鬼”,凡遇者必死无疑。沙河中无飞鸟走兽,无方向标识,只能见到死人枯骨。法显仅以寥寥数语就将这一充满玄机的自然之境勾画出来,二百多年后,唐代玄奘在西行求法过程中亦过沙河,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类似记录:

[收稿日期] 2020-09-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释家散文研究”(15BZW111)。

[作者简介] 杨朝蕾(1977—),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慢,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2]1031}

二者一简一详,所言内容极为相似,由此可见沙河之残酷与西行取法之艰辛。

法显离开焉夷国进入中国第一大沙漠——今新疆境内塔克拉玛干沙漠,用三十五天时间度过这一人间至险,《佛国记》言:“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1]11}其行程更艰辛,其用语更简要,因所受苦难非语言可形容,索性不多言,语言的局限性由此可见。不妨将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沙漠探险相比较。1896年1月14日至2月23日,斯文·赫定由和阗向东北沿克里雅河进入并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达大沙漠以北的沙雅,历时41天^①,其路线与法显基本相对;法显取向西南直进,大约从焉夷直向西南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达于阗,比斯文·赫定更长,而用时35天。可见其所言“所经之苦,人理莫比”^{[1]11},诚非虚言。

除了沙漠,雪山亦是高僧西行遇到的重要障碍。法显离开竭叉国,西行向天竺,用一个月时间得度葱岭。而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1]11}。葱岭地处中国最西端,是天山、喀喇昆仑、兴都库什三道山脉交汇处,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与阿富汗,平均海拔4000—7000米,即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其山口终年冰雪覆盖,道路十分艰险。法显所言“毒龙”,未必实有其物,极有可能是科学不发达时代人们对恶劣气候的揣测与想象,却也由此可见绝境雪域之变幻莫测的气候。离开那竭国后,法显与慧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1]43}。在这种情况下,慧景不堪复进,口吐白沫而亡。据今人考证,此小雪山系今贾拉拉巴德城以南之塞费德科山脉。^{[1]43}法显之用语虽简练,却将其时寒风骤起,令人噤战寒栗无法前行的艰难呈现出来,而慧景的殒命更是给其沉痛一击。法勇《外国传》亦记录其过雪山的情形,“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3]93}。其时只能靠插杙、拔杙,手足并用,交替攀附得以前行,艰险的处境导致十二人悲惨丧命。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跋山涉水、手攀脚蹬是在所难免的。法显记录其从陀历国过河到乌苌国的情形。其文曰:

其道艰阻,崖岸峻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

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蹶悬绝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1]6}

玄奘《大唐西域记》则记录其从乌仗那国(即乌苌国)到达丽罗川(即陀历国)的经过,二者方向相反,而所过为同一河,渡河经历极为相似,不妨参照阅读。其文曰:

耆揭釐城(即乌仗那都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即新头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绝索,或牵铁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蹶墜,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2]295}

二者皆极言渡河之艰险,却也从另一角度表现出山河之险峻,与那些单纯摹山写水之作迥然不同。

法勇《外国传》中亦描绘其一路西行所见风光,言其在过龟兹、沙勒诸国后,登葱岭,度雪山,亦面临汹涌奔腾的大江的阻隔,其文曰:

瘴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脇,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3]94}

① 参见孙仲宽译 Sven Anders Hedin《我的探险生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人在无桥可行的大江上,只能系索为桥,攀缘而过,一不小心就会人堕江中,其艰险非亲历者难以想象。

在释家异域志中还记载了危险重重的海上航行,《佛国记》载法显自师子国到耶婆提国途中见识到的大海,其文曰: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鼃、鼃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

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1]142}

此处写出大海的辽阔与诡谲,变幻莫测,及人行海上时险象丛生,不小心触礁,则死无葬身之地。竺枝《扶南记》描述扶南之水道,特别写了海水涨潮的情景,其文谓:

自船官下注大浦之东湖,大水连行,潮上西流,潮水日夜长七八尺,从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长丈六七。七日之后,日夜分为再潮,水长一二尺。春夏秋冬,厉然一限,高下定度,水无盈缩,是为海运,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名。《晋功臣表》所谓“金甌清泾,象诸澄源”者也。^[4]

对于生活于内陆的高僧而言,亲睹海水涨潮的情景,无疑是新奇的,所以用质朴的文字将其记录于地志中。

在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中记录的沙漠、雪山、高山、深涧、大海、潮汐等自然险境,无疑为其时地志增添了新奇的内容,同时也表现了高僧西行求法一路上险阻重重,某些时候甚至要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今读来,其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及文学价值。

二、释家异域志之奇闻异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搜奇猎异之风一直盛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出现大量《博物志》《异物志》之类书籍。对于释家而言,无论是否去过域外,域外的奇异物产都对其产生极大吸引力。他们或耳闻,或目睹,均将这些异物记录在异域志中。法显《佛国记》称:“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1]18}可见,域外植物之种类与汉地迥然不同。竺枝《扶南记》记载顿逊国有神奇的酒树,与安石榴相似,“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5]3489}。法显《佛国记》记载在师子国有贝多树,“高可二十丈,其树东南倾,王恐倒,故以八九围柱拄树。树当拄处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围许,柱虽中裂,犹裹其外,人亦不去”^{[1]129}。段程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物之三》亦有类似记载:“贝多树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6]贝叶是用贝多树的叶片经特殊工艺制作而成,坚硬耐磨而又不怕水,在古代用铁笔在其上刻写佛教经文,尔后再涂墨,用布摩擦,让墨汁存留在刻痕内,之后再装订成册,具有防潮、防蛀、防腐的特点。用贝叶刻写的经书,可以经百年而不烂,最初出现于印度,后随佛教传入我国,至今在西藏、云南众多寺庙中仍保存大量贝叶经文。

动物亦有甚为奇异者,竺枝《扶南记》记载在扶南国源潭中“有鲜鱼,色黑,身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4]840}。据当代学者考证,其较为符合抹香鲸的特点。台湾学者邱仲麟先生于2019年11月29日在复旦大学的讲座《鲸豚搁浅: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中,征引康熙年间的一则县志资料,记载一条搁浅大鱼“形如车轮,头如马首”,认为其较为符合抹香鲸的外形特点。其实,这一史料亦见于《清史稿·灾异一》:“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海盐有大鱼,长十丈余,形如车轮,头似马首。”^[7]这种“头似马首”的大鱼与上文竺枝《扶南记》的记载甚为吻合。扶南,是古代中南半岛的古老国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柬埔寨全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由上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抹香鲸已在东南亚一带活动。另外,《扶南记》还记载扶南国川浦中“有水虫弥微,攢木食船,数十日坏”^{[4]840}。此处

所言“水虫”，形体微小，且能攢木食船，当与蛀虫相似。宋陈翥《桐谱·器用》曰：“然而采伐不时，则有蛀虫之害焉。”^①蛀虫是以啃啮树木为生的小虫，形体虽小，穿木如锥。竺枝言其蛀食船板，使之毁坏。除此之外，在佚名《扶南俗》中亦记载扶南的诸多异物，如鲫鱼、鰩鰭、鲭鱼、鳄鱼、鼉鼉、擗剑等。其中“鼉鼉”，见于《文选·吴都赋》李善注，曰：“龟属也，其形如笠，四足纒胡无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以饰物，肉如龟肉，肥美可食。”^②旧本题后汉郭宪撰《洞冥记》载：“影娥池中有鼉龟，望其群出岸上，如连璧弄于沙岸也。故语曰‘夜未央，待龟黄’。”^③影娥池，系汉代未央宫中池名。由此可见，汉代这类鼉龟已被养在未央宫池中，而其源亦有可能来自扶南。释法盛《历国记》记载波罗奈国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细长，可四尺余。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寿。国人皆寿五百岁，牛寿亦等于人，亦天竺属国”^④。《新唐书·西域传上·天竺国》有类似记载，“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细，长四尺许，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⑤，不知是否取材于此。稍割牛的奇特之处在于牛角要十日一割，否则会丧命。法显《佛国记》载蓝莫国“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此塔，昼夜供养”^⑥；又有群象，“以鼻取水洒地，取杂华香而供养塔”^⑦。守护佛塔的龙与供养佛塔的象，皆为佛教中的通灵之物。支僧载《外国事》记载毗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后。奴若长取米，龙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⑧。此处的“神龙”与中国民间的“圣虫”有相似之处，“圣”谐音“升”或“剩”，意为生根或剩余，寓意五谷丰登，寄托农耕时代人们对粮食与谷物的推崇与敬重，亦体现了万物均有圣灵主宰的观念。法显《佛国记》载在僧伽施国有白耳龙，亦属佑护众生之神物，“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使众僧得安”^⑨，众僧感其惠，为作龙舍，福食供养，“每至夏坐迄，龙辄化形作小蛇，两耳边白”^⑩，众僧以铜杆盛酪，以龙置中。

释道安未去过西域，其《西域志》据传闻而成，却颇具志怪色彩。其记载于阗道中有鼠王国，“大者如狗，小者如兔，著金袈裟。沙门过，不礼。白衣不礼辄害人”^⑪。胡国北有鸡城，“北有人皆冠，象鸡也”^⑫，这样的记录明显带有猎异心理。支僧载《外国事》载有大秦国人，“援臂长胁”^⑬。《太平御览》引佚名《外国图》曰：“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猿臂长胁，好骑骆驼。”^⑭《水经注》亦引《外国图》曰：“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⑮杨守敬谓：“观后文引支僧载《外国事》云‘据，晋言十里也’，称晋与此条同，此岂支僧载《外国事》之图欤？”^⑯《外国图》是否为《外国事》之配图，无足够证据，暂且存疑，其大秦国人之猿臂长脇形象亦足堪称奇。法显《佛国记》言师子国之来历，“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⑰。此无疑是传闻，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师子国原来是鬼神与龙的王国，更在于鬼神与商人的贸易活动，简直与志怪小说无异。

除此之外，释家异域志中尚有不少充满灵异色彩的器物。释道安《西域志》载拘夷国北去城数百里，“山上有石骆驼，溯水滴下，以金铜铁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唯瓢瓠不漏。服之令人身臭，毛皮尽脱，得止”^⑱，可见其非同凡响。释智猛《游行外国传》载其在奇沙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⑲，更神奇的是此钵能够感应道心，智猛以香花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⑳。《高僧传·鸠摩罗什》载：“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㉑此处的沙勒国即上文所言奇沙国，佛钵系佛陀生前所持用之食钵，其具有的感应功能在智猛与罗什处表现一致，能够因人心分别而轻重悉异，乃佛教圣物。此处通过神化佛钵，以突出佛陀的法力与神通。

① 参见陈翥《桐谱》，明刊唐宋丛书本，第11页。

② 参见郭宪《汉武洞冥记》，明正德嘉靖间顾氏文房小说本，第16页。

同一佛钵,亦被法显详细地记录在《佛国记》中,其文曰:

佛钵即在此国(弗楼沙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刻有七百余僧,日将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而供养,正复百千斛,终不能满。^{[1]34}

此处言及月氏国兴兵弗楼沙国,欲夺取佛钵,而以大象、四轮车均载不动,后深自愧叹,遂于其地建塔与伽蓝,供奉佛钵。并且还具体写到佛钵的外形为“四际分明,厚可二分”,容量为“二斗许”,其颜色为“杂色而黑多”,更神奇的是其容量可大可小,与投入之人的财富状况相关。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二载佛钵之来历:“时四天王即遥知佛当用钵,如人屈伸臂顷,俱到颍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钵,香洁无秽。四天王各取一钵,还共上佛:愿哀贾人,令得大福。方有铁钵,后弟子当用食。佛念:取一钵不快余三意,便悉受四钵,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钵,令四际现。”^①因其为四钵合一,所以才有智猛所言“四际尽然”,法显所言“四际分明”的特点。以上种种,皆突出佛钵之神奇来历与特异功能。试想,佛陀所用之物尚且如此玄妙,佛陀之法力更是无可估量,以背面敷粉之法,由物及人,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暗蕴对佛陀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赞美。

释家异域志中还记载外在普通而内含神圣意味之物,如在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1]117}。所谓“榛”,《淮南子·原道训》里有“木处榛巢”,高诱注曰:“丛木曰榛。”^[14]犹言杂木丛生之林。这样一片看似平常的杂木林,其来历却颇具传奇色彩。《佛国记》载:

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为说法,尽还得目。盲人欢喜,刺杖著地,头面作礼。杖遂生长大,世人重之,无敢伐者,遂成为榛,是故以得眼为名。祇洹众僧中食后,多往彼榛中坐禅。^{[1]117}

杂木林的名字之所以为“得眼”,是因为曾经有五百盲人在此听佛讲法而使眼睛复明,遂刺杖著地,而生此林。如此,赋予此林以神圣意味,无人敢伐,成为众僧坐禅之林。此乃佛教传说,由佛陀讲法而使盲人复明之事迹,彰显其慈悲为怀、神通广大、普度众生之品行,使这一普通的杂木林成为可资纪念的圣迹,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佛国记》还记录在达嚧国,有一波罗越寺,寺中常有罗汉住。其地丘荒,没有民居。距离此地极远方有村,“皆是邪见,不识佛法、沙门、婆罗门及诸异学”^{[1]62},更奇异的是接下来的叙述:

彼国人民常见人飞来入此寺。于时诸国道人欲来礼此寺者,彼村人则言:“汝何以不飞耶?我见此间道人皆飞。”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1]62}

此国人民因见人飞入波罗越寺,而以为凡入此寺者,皆需会飞,而问道人何以不飞,道人言己翅膀未成,显然属于戏谑之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之前飞入寺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正是前文所言的罗汉。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梵语为 arhat,巴利语为 arahant,专指小乘佛教中所得之最高果位者。《四十二章经》云:“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②意谓证得阿罗汉者,无爱欲情仇,亦不受肉体限制,可自由飞行,变化无穷,无生无灭。对于该国不识佛法之人而言,自然不明那些飞来之人已证得阿罗汉,而道人不明说自己修为不够,却顺其意言翅未成,颇具幽默色彩。此事未必为法显所亲睹,极可能为听闻,却为其《佛国记》增添几分神奇色彩与诙谐意味。在陀历国,亦曾有一罗汉,《佛国记》载:

① 参见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497。

② 参见迦叶摩腾、竺法兰译《四十二章经》,《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570。

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1]22}

兜术天,为梵文 Tusita 之音译,亦作兜率天或睹史多天,是弥勒菩萨所居之处,是佛教理想中的一种天上幻境。这一罗汉,亦具神力,能够将一凡夫巧匠送上兜术天,让其见弥勒菩萨,之后回来为其制作木像,如此往返三次,像才制成,且保存下来。由此可见,罗汉之法力超凡。此记载亦颇具神话意味,为陀历国增添神秘色彩。法显又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1]22}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亦语“自有此像,法流东派”^{[2]296},可见此弥勒佛像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法显在《佛国记》中还记载距毗舍离国城西北三里放弓仗塔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其文曰:

恒水上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特,王即取养之。遂使长大,甚勇健,所住征伐,无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王:“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忧!但与城东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贼到时,小夫人于楼上语贼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仰向张口。”小夫人即以两手搆两乳,乳各作五百道,堕千子口中。贼知是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于是思惟,皆得辟支佛。^{[1]80}

在惜墨如金的《佛国记》中,法显花大量篇幅记录这一奇闻,可见其对此甚为重视。此故事亦载于《杂宝藏经》,属于“阿含藏”系统,汉译本最早由北魏吉迦夜与昙曜二人共译。其第九卷为《鹿女夫人缘》,情节与法显所言大同小异,其中千子即贤劫千佛,千子之父为梵豫王,下游国王为乌耆延王,千子之母即摩耶夫人。《长阿含经》卷十一载,此塔为中印度毗舍离城四塔之一,又名多子塔,位于该城之西。可见,尔时在法显看来,此事颇具价值,故不惜笔墨将其载入《佛国记》。此故事既折射出宫廷内部夫人们之间的内斗,又表现了国与国之间频仍的战争。

竺枝在《扶南记》记载其亲眼所见的不朽肉佛:

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夫金刚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穷,大觉难测者矣。^{[4]5}

这位高僧在火化之时,并未燃烧,肉体得以保存下来,几十年而不腐烂,故成不朽肉佛,竺枝言其目见之,当不为虚。只是,与其他在圆寂后经弟子处理而成的肉佛不同,此高僧遗体被烧至数千束薪而不化。所以,竺枝感慨其乃修成金刚不坏之身,才得以永存。《大宝积经》卷五二云:“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坚固之身,超于三界最胜之身。”^①《大般涅槃经》卷三亦云:“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②此事甚怪异,竺枝将其记录在《扶南记》中。

三、释家异域志之土风民俗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中涉及西域多个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土风民俗,其内容丰富,包括居住环境、饮食习惯、衣着打扮、交通状况、丧葬习俗等,颇具研究价值。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谓不同地方的自然环境影响到当地人的衣食住行与精神气质。北魏惠生《行传》记载钵和国“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唯食饼粳,饮麦酒,服毡裘”^{[15]2280}。钵和国在今阿富汗东北角兴都库什善北瓦罕地区,海拔在 2000—3000 米,属

① 参见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中华大藏经(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871—872。

② 参见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中华大藏经(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于高寒地区,每年有长达8—9个月的大雪封山期。此地地势复杂,气候恶劣,人们过着高山游牧生活,住在毛毡制成的帐篷里。惠生言其人畜同居,穴地而处,诚非虚言。而其饮食为面粉制成的干粮饼炒,喝麦酒,衣着为毡裘,均与其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波知国“土狭人贫,依托山谷”^{[15]2280},朱居国“其人山居,有麦,多林果”^{[15]2279},乌菴国“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15]2280},均一语带过,而又突出不同国度的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居住环境。支僧载《外国事》载耶河维国“土丰乐,多民物,在迦维越南,相去三十里”^{[5]3542}。法显《佛国记》载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1]7},竭叉国“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1]18},乌菴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1]28},此处的“中国”指中天竺,亦关注到这些国家的气候、物产与人们的衣着、饮食等方面,表现他们对当代百姓生活的关注。关于异域人的居住环境,释家异域志亦有涉猎,如《佛国记》载师子国之王城“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1]130}。可见其房舍街道颇具规模,且佛教风气兴盛。亦有地广人稀、野兽横行的国度,如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1]70},拘夷那竭“城中人民亦稀旷,止有众僧民户”^{[1]76}。

《管子·牧民》指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6]意谓,百姓能够丰衣足食、物质充沛,才能顾及礼节,崇尚礼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属于底层缺乏型需要,这些需要满足后,才谈得上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与管子的观点相佐证。所以,对人而言,衣食住行是最低需求,满足后才可言尊重与爱及自我价值的实现。释家异域志亦关注到不同国家人的精神层次之差异,那些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的国家,百姓缺衣少食,很难兼顾礼节。如《佛国记》载,焉夷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1]8}。反之,那些富裕的国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修养更高。于阗,建立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代),以农业、种植业为主,为西域南道中国势最强的国家之一。自二世纪末佛法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法显《佛国记》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1]11}。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亦谓此国人性温恭,崇尚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习大乘法教。僧伽施国,“其国丰饶,人民炽盛,最乐无比。诸国人来,无不经理,供给所须”^{[1]53}。其时,中天竺最大的城邑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民人富盛,竞行仁义”^{[1]88},亦为法显所赞誉。师子国四季不分,气候宜人,“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1]11}。从法显简短的叙述中,能够感受到这些国度人的物质生活丰裕,精神亦自足自乐。

百姓的生活状况直接折射出国君的统治情况,此类记载亦在释家异物志中比比可见。惠生《行传》载,波知国“其王不能总摄”^{[15]2280},而康国“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15]2280},所以波知国“土狭人贫”^{[15]2280},而康国则属富庶之地,“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犍牛、黄金、硃沙、甘香、阿薛那香、瑟瑟、麝皮、鼈鼉、锦、叠。多葡萄酒,富家或致十石,连年不败。太延中,使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15]2281}可见此国不仅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商业亦甚为兴盛,且曾向北魏皇朝进过贡。

《佛国记》中的摩头罗国更是一个自由富足的国度:

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1]46}

摩头罗国,是梵语 mathurā 之音译,又被译为秣菟罗国,佛陀时代(公元前 6—前 4 世纪)为印度次大陆十六大国之一,地处印度古代交通要道上。在法显笔下,这个国家气候宜人,人民殷富,无苛捐杂税,无严刑酷法,信奉佛教,戒酒戒杀戒五辛,贸易发达。唯独旃荼罗与此不同,却也以击木的方式自明身份,与其他人并无冲突。旃荼罗,为梵语 candāla 的音译,系古印度种姓制度下最低级族类。《翻译名义集》卷二:“旃陀罗,此云屠者,正言旃荼罗,此云严炽,谓恶业自严。行时摇铃,持竹为幟帜,故若不尔者,王必罪之。”^{[1]49}旃荼罗多从事屠夫和刽子手等职业,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此处谓其“名为恶人,与人别居”^{[1]46}。在法显笔下,摩头罗国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国度。

异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亦非中土人士所能想象,《史记·大宛列传》载身毒国“人民乘象以战”^[17];《后汉书·西域传》有类似记载,谓东离国乘象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18]2922};《周书·异域传下》载波斯国“出白象”^{[19]920}“战并乘象,每象百人随之”^{[19]919};然而均未具体讲如何作战。释家异域志对此有直接描写,北魏惠生《行传》载乾陀国“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15]2281}。象,不仅是出战的坐骑,亦可以鼻缚刀而战,其威力甚大,而七百头斗象同时出击,声势显赫,所到之处夷为平地。虽寥寥数语,已将异域骑象作战的规模与气势尽呈纸面,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农耕时代,靠天吃饭。天旱不雨之时,古人会设坛命女巫为舞以祈雨,即所谓舞雩。此类祈雨巫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中亦记载此类祈雨习俗,不过与汉地不同。《佛国记》载在那竭国,“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养。彼国土亢旱时,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既大雨”^{[1]39}。僧伽梨,即僧伽胝,梵文 Sanghati 音译,指佛僧之法服,即复衣或大衣,为比丘所服“三衣”之一。《佛国记》载在迦维罗卫城,“佛在尼拘律树下,东向坐,大爱道布施佛僧伽梨处,此树犹在”^{[1]70}。可见,这件僧伽梨系大爱道布施给佛陀的。《长阿含经·游行经中》谓“尔时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胁”^①,仍系此衣。凡佛陀用过的东西,无一不具法力。那么这件佛陀的法服,有如此神力,可以搬出祈雨,亦不足为怪。那竭国用以祈雨的习俗也就独具佛教意味。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还涉及到不同国度的交通状况,如北魏惠生《行传》载乌苌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15]2280},赍弥国“东有钵虏勒国,路险,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15]2280},钵和国“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嚧唎,一道西南趣乌苌,亦为嚧唎所统”^{[15]2280},可见这些国家内部或彼此之间交通并不发达,受制于其恶劣自然条件与经济状况。

刑罚诉讼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释家异域志中亦有所关注,北魏惠生《行传》载乌苌国“人有争讼,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15]2280},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处理方法,以药来判断诉讼中的输赢;康国“有胡律,置于袄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15]2281},堪称赏罚分明。《佛国记》载摩头罗国“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1]46},较之汉地动辄因莫逆罪而身首异处、株连九族,该刑罚自然不重。

丧葬风俗亦为释家所瞩目,将不同国家的处理方式记录在异域志中。竺枝《扶南记》载:

顿逊国,属扶南国,主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疾困便发愿鸟葬,歌舞送之,邑外由鸟啄食,余骨作灰,甕盛沉海。鸟若不食,乃篮盛火葬者投火,余灰函盛埋之。祭祠无年限。^{[5]3489}

① 参见佛陀耶舍、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中华大藏经(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顿逊国的鸟葬仪式,与西藏的天葬相类似。当前学界认为,西藏的天葬起源于印度,所以二者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亦可以理解。人去世后,将遗体交于鸟来啄食,是认为鸟可以将之带到天堂,以赎回生前的罪孽,且利于灵魂转世。玄奘《大唐西域记》亦有关于天竺“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2]208}风俗的记载。只不过竺枝的记录更详尽,似乎不仅是鸟葬,还配以火葬,这是与西藏天葬仪式不同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中的风土人情书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价值,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参 考 文 献]

- [1]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4]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840.
- [5]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 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2:109.
- [7]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509.
- [8]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83.
- [9] 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193[M].北京:中华书局,1998:5260.
-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7.
- [11] 欧阳修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663.
- [12] 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
- [1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4] 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
- [15]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1.
- [1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6.
- [18]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2.
- [19]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责任编辑:程晓芝)

The Writing of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of the Buddhist's Exotica Geographical Record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YANG Zhao-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ith the rising tide of Buddhists going west to seek Dharma, there were a lot of Buddhist's exotica Geographical Records. They mainly record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minent monks who travelled in danger and sought for dharma in the West. There are also vivid descriptions of exotic objects,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There are not only true records of the natural dangers, but also vivid descriptions of strange foreign objects outside the country. Different local customs and custo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living environment, eating habits, dress, traffic conditions, funeral customs, etc. could also be found in these records. It is of great value in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logy,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and deserves our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Buddhist; the exotica Geographical Records; the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